

· 文明史与当代青年问题 ·

“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

——历史与现实中的青年问题

石岸书

【内容摘要】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人”即“新青年”，“新人”的抽象普遍性由“新青年”的革命性所激活、再造和现实化；“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得以生成，这既是主体性生产的辩证法，也是创造新政治的辩证法。在革命年代，“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表现为先锋队与主力军的关系；改革初期以来，二者的典型形象分别蜕变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昭示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转变。在“中国道路”的新时势中，当代青年再次展现出清晰的主体性，他们拥有强烈的劳动者意识、国族意识和文明意识，标志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再造。

【关键词】 新青年 新人 新文化运动 中国道路

【作者】 石岸书，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2020ECNU-HLYT072）

我们已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新的历史主体。谁才是属于这一时代的新的历史主体？或者说，怎样的人是属于这一时代的新的历史主体？这些问题使我们将目光聚焦在青年之上，并将我们带入历史，带入“新青年”与“新人”交相涌现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此，笔者想捕捉并勾勒几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所展现的“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关系，进而将历史的视野延伸到今天我们所迎来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尝试使当代青年问题在历史的烛照下彰显出其新颖性。

启蒙与革命：“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生成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召唤和培育“新人”以创造新政治，而这一“新人”即“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标志，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即自称“本志之天职”为“改造青年





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帮助青年生成“根本之觉悟”^①，从而成就“新人”（“新青年”）。王汎森的研究表明，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无政府主义等激进思潮的影响、对旧的国家政治的不满以及进化论的渗入，“新人”取代“新民”成为此时社会关心的焦点，“新人”被视为脱离旧有组织、阶级和国家的普遍的个体，是“人类中的一个人”，因而“新人”意义上的“人”都被打上引号，以表示是一种理想状态的人。^②

问题是，为何“新人”与“新青年”同一，或者说，为何“新人”就不能是“中年人或老年人”？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锚定青年为“新人”的载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知识界是从进化论角度来论证青年处在更新、更富创造力的生命状态之中的。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开首即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而“吾国之社会”，陈腐朽败之分子似已无药可救，只好“听其天然之淘汰”，旧社会陈腐朽败如此，只能通过“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的奋斗，“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③。在这里，生理年龄的“新”（青春）、生命状态的“新”（新鲜活泼、敏于自觉、勇于奋斗）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革新目标，被构造为一个连续的因果链：新青年—新的创造与实践—新社会。对于陈独秀等新文化领袖来说，青年所内在的身体—生命状态的“新”即意味着无限的革命性潜能，这种革命性潜能是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存在，因而青年能突破外在性的局限（包括旧文化、旧社会和旧的共和政治的局限），并将这种革命性潜能转化为现实的、革命的运动，从而创造新政治，最终再造新社会。

然而，青年并不必然是“新”的，正如陈独秀所言，“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④尽管青年由于身体—生命的“新”而天然地拥有“新”的革命性潜能，但“新”同样是“觉悟”的结果，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汪晖谈到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性时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动态的主体性生产的过程，唯有通过“新文化”及其“运动”，才能“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人’”^⑤。青年之为“新”，既根源于身体—生命之“新”，也根源于“新文化”及其运动，就这两方面所指向的对象而言，“新人”即“新青年”。这样的“新青年”，无疑既是一种新的文化主体，也是一种新的政治主体。

“新人”是“人类中的一个”，它意指普遍的个体；但作为“人类中的一个”，其普遍性是抽象的、抽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规定的。“新人”毋宁说意味着一种召唤，召唤着它自身的历史化和具体化，由此“新人”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实性存在。而“新人”即“新青年”意味着，这一召唤的对象正是新青年。“新青年”是特殊的现实性存在，基于“新”的身体—生命状态和新文化而生成，内在地具有革命性潜能，能在现实实践中开创普遍的新政治，从而使“新人”的抽象普遍性上升为具体的普遍性。在此意义上，“新青年”是“新人”的具体化，是“新人”最早的样板，“新人”的普遍性是由“新青年”的革命性所激活、再造和现实化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得以生成，这既是主体性生产的辩证法，也是创造新政治的辩证法。

然而，进入革命年代，在民族抗战和社会革命的历史形势下，“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发生了关键性变化。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说：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⑥

在毛泽东的表述中，新文化运动时期占据文化-政治运动中心的“新青年”，在革命政治中获得了新的位置：先锋。而曾经居于边缘的工农群众，则成为主力军，在革命政治中占据主体位置——他们就是革命政治所召唤和诉诸的“新人”。工农群众作为“新人”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工农群众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定义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无产阶级是继资产阶级之后世界历史舞台上全新的阶级，也是最后和最普遍的阶级；其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使工农大众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他们是全新的政治主体，其使命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创全新的、更具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新政治。在这里，“新人”的抽象普遍性被赋予阶级性的具体内涵。

不但如此，“新人”所召唤和想象的，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者。1937年，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中明确给革命“新人”下了定义：“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此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名篇一再为“新人”的内在特质提供说明和榜样。这样的“新人”具有崇高的道德责任感，但更认同并献身于政党的政治追求和价值理念。可以说，这是基于全新的政党而来的“新人”。

革命年代，工农大众和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者是革命政治中的“新人”。“新人”之“新”根源于其阶级本性和党性，因而他们不但内在地具有革命性的无限潜能，而且是开创更具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新政治的主体。工农大众和共产党人作为“新人”，不但是普遍性的，也是革命性的。这无疑意味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重构。对于革命政治来说，新青年并不必然是“新人”，新青年基于“新”的身体-生命状态和新文化而来的革命性潜能，并不能保证其必然地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创造者。毋宁说，“新青年”需要阶级觉悟的改造，才能成为“新人”，从“新青年”到革命“新人”的转变，主要取决于“革命的态度”，取决于是否愿意和能够与广大工农大众结合。这种转变，就是阶级觉悟改造的过程，就是党性提高的过程，也就是“新青年”从“先锋队”转变为“主力军”的过程。

但另一方面，“新青年”并不总是外在于“新人”，因而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新青年”本身就内在于“新人”的生成之中。如毛泽东所说，需要新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这一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过程既是“新青年”自身转变为革命“新人”的过程，更是使工农大众真正成为全新的政治主体，即革命“新人”的过程。不但如此，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汲取了“新青年”的革命性潜能，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⑦，就此而言，“新青年”一定程度上仍然承担着激活和再造“新人”的使命，“新青年”的革命性潜能依然是激活和再造“新人”的动力之一。



“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在革命年代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先锋队与主力军的关系：先锋队既需要转变为主力军，也与主力军共同构成革命主体。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不仅是“新”的身体-生命状态和新文化，而且更是“新”的阶级-政党，构成了“新青年”之“新”的根源，也构成了“新青年”转变和激活“新人”的动力，还构成了创造普遍性的政治的内在根基。“新青年”基于身体-生命状态的“新”，已汇入基于阶级-政党的“新”之中，新文化运动作为“新人”的主体性生产机制，已汇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作为“新人”的主体性生产机制之中。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的问题统摄着“新人”的问题，那么在革命年代，则是“新人”的问题统摄着“新青年”的问题。自此而后，“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重现的双重变奏。

建设与改革：“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使得“新人”获得了新的问题性。这种新的问题性体现在，“新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新人”开始指涉两类对象。一方面，“人民”的敌人与旧知识分子经由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成为新中国的“新人”，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成为主体性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人民，尤其是对于工农兵群众和“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一代来说，其主体性生产机制依然是基于阶级-政党的“新”而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结果便是“社会主义新人”^⑧。此时“社会主义新人”是最具普遍性的存在。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价值观是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正是社会主义新精神的核心；其次，将人民群众普遍地召唤、培育和塑造为“社会主义新人”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目标，而“社会主义新人”的普遍造就同时意味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普遍主义政治的实现。

“社会主义新人”指向工农兵群众，自然也指向工农兵群众的青年一代，即“社会主义新青年”。事实上，“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正是青年：无论是文学想象中的梁生宝（《创业史》主人公），还是现实中的雷锋，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他们无不是青年。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新青年”，本质上被理解为同时蕴含着阶级的“新”和身体-生命状态的“新”，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并不用经历一个“从旧到新”的转变和再造过程，而需要的是“从无到有”的激发和生成。事实上，这一“从无到有”的激发生成过程，与社会主义实践过程是同构的，“社会主义新人”/“新青年”的培育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而青年一代似乎一时间难以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迈向新时期，显露出精神上的困惑。20世纪80年代广为讨论的“潘晓来信”是其中症候性的案例。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发了一则署名“潘晓”的青年读者来信，信中“潘晓”发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随后，以《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为阵地，“潘晓来信”引发广泛讨论，数千万青年卷入其中，堪称波澜壮阔。^⑨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有代表性的青年形象之一，潘晓既不像“社会主义新人”，也难以被称为“新青年”：曾经定义“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价值观集体主义，被潘晓痛苦而半信半疑地代之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个人主义；而潘晓精神上的迷惘、失落与低沉，似乎症候性地昭示着“社会主义新人”内涵的转变。

问题的关键是，谁是“新人”？在“潘晓讨论”爆发前一年，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

开启“改革文学”，塑造了改革者乔厂长的形象。在蒋子龙的创作意图中，他的“本意是想写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典型”^⑩。乔厂长呈现出与潘晓截然不同的形象：潘晓是青年，而乔厂长却是老干部；与潘晓陷入精神迷惘不同，乔厂长似乎从来没有精神危机，始终涌动着充沛的生命激情；与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个人主义不同，乔厂长坚守集体主义，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在改革初期，乔厂长这一人物形象激起普遍的时代共鸣，被誉为新时期“四化”建设的“带头人”^⑪，是属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⑫，也因之迅速成为改革初期“改革者”的代名词。时隔40年，蒋子龙还因其乔厂长形象的塑造，被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100名“改革先锋”之一的荣誉。

但乔厂长是老干部，以老干部作为改革“新人”的象征，其勇于开拓的革新精神与身体-生命状态的“老”形成鲜明对比，而青年潘晓，其身体-生命状态的“新”与精神的“衰老”同样形成强烈反差。这一切使我们看到，在改革初期，“新人”与“新青年”的内在联系似乎脱离了，“新人”之“新”并不需要以身体-生命状态的“新”为前提——事实上，乔厂长作为改革“新人”的典型形象的确立，正是建立在与精神衰老的青年一代的对比和区别之上的。

这意味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重大转变。从新文化运动直至新中国前三十年，基于身体-生命状态的“新”一直构成了“新青年”之“新”的前提，也是“新人”之“新”的构成性要素；“社会主义新人”虽然从根本上是基于阶级-政党之“新”的，然而，这种“新”仍然需要吸纳身体-生命状态的“新”作为不断生成与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生命政治动力，故而“社会主义新人”常常以青年为典型形象。然而，在改革初期，老干部乔厂长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排除了身体-生命状态的“新”作为自我界定的条件，“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在此似乎被重构：尽管“新人”的问题仍然事关新的政治主体的生产与新的政治的创造，但似乎不再与“新青年”的问题产生不可或缺的必然联系。由此出发，这一重构开启了“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走向转折的历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经济大潮和文化氛围中，那种将青年纳入历史时势的特定格局中的文化-政治视野一定程度上萎缩了；社会对青年的想象、引导与形塑，以及青年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行为，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经济问题。随着青年问题被放置在社会-经济的维度中理解，青年也被仅仅想象和自我想象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他们服从制度性安排，在消费文化和技术统治中建构别一种主体性。在这种条件下，青年的所谓“新”“先锋”，仅仅是在消费文化中获得自我表达，并使之转化为消费动力，从而有效地刺激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于是，“新青年”从文化-政治领域转移，而存在于经济领域中并成为消费“先锋队”。经历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来回冲刷后，青年的典型形象迅速地蜕变为时尚的消费者形象。

在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历史段落里，作为改革“新人”的企业家是生产者，而作为“新青年”的青年一代则是消费者。在生产与消费的无限循环里，“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似乎获得了新的历史形式。然而，这种新的历史形式却同时意味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某种终结。其根源在于，在生产与消费的世界中，“新青年”与“新人”变成了无限循环的经济过程中的两个无差别的部分，丧失了内在的政治性。归根到底，“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核心是关于新的政治主体的生产与新的政治的创造的问题。当把“新青年”与“新人”的关系把握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时，新的政治主体的生产问题便蜕变成了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问题。因此，生产-



消费的经济逻辑, 压抑了“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可能性。

“中国道路”的新时势：“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再新

自现代以来, 新的历史时势总是伴随着对“新人”的呼唤。百年来无论是共和危机, 还是民族抗战与社会革命之时, 也无论是百废俱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冷战危机一触即发的 20 世纪 60 年代, 抑或是开启新时期的改革初期, 无一不伴随着培育和再造“新人”的历史任务。而“新青年”的问题则与“新人”问题相始终。今天, 中国或许已经再次面临着新的历史时势, 这使得“新人”的问题重新凸显, 从而使“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得以再新。

2008 年以来, “中国道路”已逐渐成为世界史的显见事件, 拥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的中国正在客观地影响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格局, 也因而频频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打压。经由全球化所形成的互相高度依赖的分工网络和即时互动的多媒体矩阵, 这种紧张关系迅速地传导到日常生活之中, 潜移默化地促使日常生活政治化, 而当代青年正是最早感受到这种政治性的群体。不知不觉间, 他们的典型形象早已不再是去政治化的、时尚的消费者形象, 而是重新展现出清晰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起码拥有三重维度。

其一, 当代青年具有清晰的劳动者意识。即使是在最为消费主义的网络文学中, 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例如, 在大部分的网络小说中, 主人公被明确地放置在一个等级结构(往往表现为等级清晰的王朝、商海、武林或玄幻世界等)的底层, 承受着整个等级结构的重负。在这样的故事设定中, 主人公清醒地意识到, 必须通过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才能跨越等级, 摆脱重负。主人公始终以这个等级结构为舞台、为目标、为敌手, 而艰苦奋斗则成了主人公唯一可以凭借的武器。对网络文化中的“流行梗”略加分析, 我们将更强烈地感受到当代青年的劳动者意识: 从十年前“屌丝”“穷矮矬 VS 高富帅”到时下正在流行的“打工人”“内卷”等, 在这些“流行梗”所包含的戏谑、自嘲和无奈之中, 可以看到当代青年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在新的生产-劳动空间之中的位置, 清晰地把握到社会结构中的劳动关系及自身在这一劳动关系之中的身份。

其二, 当代青年具有强烈的国族意识。已有研究指出, 当代青年中涌现出“工业党”和“90 后”爱国青年两个青年群体。2011 年以来, 以“80 后”为主体的“工业党”正式崛起于网络, 他们“主张用工业化程度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工业党’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 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 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 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③。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 将“工业党”的政治性凸显出来。2016 年以来, 网络上同时崛起了以“90 后”为主体的爱国青年。他们是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 他们在日常的亚文化消费中锻炼出了强大的组织性和深厚的媒介素养, 并且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能够为了国族尊严而开展网络集体行动。^④

其三, 当代青年具有强烈的文明意识。与“工业党”等的涌现密切相关的, 是当代青年在他们强烈的国族意识中连带地生成着明确的文明意识。一方面, 国族意识的高涨必然伴随着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思考、探索和坚持; 另一方面, 这种文明意识也回应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的意识形态。由萨缪尔·亨廷顿提出而被西方政要广为接受的“文明冲突论”, 其要

害是刻意地将国家的边界与文明的边界混同为一,从而使得弥散性、交融性的文明关系被曲解为敌我界限分明的国家关系,进而为西方世界主动挑起的国家冲突进行合法性辩护。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当代青年坚决地批判“文明冲突论”,他们展望和拥抱一个互相交融的全球文明,与此同时,当代青年强烈的国族意识中同时包含着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强烈认同和坚守,这在当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的认同和对西方现代性的诸般批判等现象中屡屡展现。

总之,这一切都表明,当代青年的典型形象,已不再是深陷于生产-消费的经济逻辑之中的时尚消费者,而是重新呈现为一种具有清晰的主体性的新形象。

不过,与此前历史不同的是,当代青年的主体性的普遍生成,并没有陈独秀这样的外在于青年群体的领袖的召唤和领导,而是凭借着BBS、门户网站和社交网络的便利,以志愿的形式,自发自觉地在线上线下互动、交往和行动;他们自发自觉地建构自己的社群、行动网络乃至独特的“宏大叙事”,形成越来越广大的、具有较为清晰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群体。可以说,置身于“中国道路”的新时势中的当代青年,拥有全新的主体性生产机制。这种新的主体性生产机制吸纳身体-生命状态的“新”,也吸纳阶层-政党的“新”,但更依赖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所建构的“新”的生态,从而与日俱增地开展着自发自觉的主体性生产。

当代青年就是我们时代的“新青年”。基于“新”的身体-生命状态,基于互联网和新媒体而来的“新”的交往、生活和行动模式,基于“中国道路”的历史新时势而来的“新”的日常生活的政治性,当代青年自发自觉地重建起属于我们时代的“新青年”形象,也即属于我们时代的新的主体性形象。如何研判乃至引领当代“新青年”,如何推动当代“新青年”的劳动者意识、国族意识和文明意识熔铸为更具现实效力和包容性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担当,或许是我们时代的关键任务。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当代“新青年”的诞生,也意味着正在展开的历史新时势中的“新人”的涌现,正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正是最早涌现的“新人”。今天,如果要追问,谁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新人”?当代青年或许正在或已经给出回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青年通过重建自身的主体性,重启了“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历史新时势需要新的历史主体来承载,而新的历史主体不能仅仅限于“新青年”,更应包括普遍涌现的“新人”。当代“新青年”的诞生,或许正在展现出这种可能性,即“新青年”所内在的政治性,正在重新激活和再造历史新时势中的“新人”的普遍性。作为“新人”的当代“新青年”,正在召唤和预示着“新人”的普遍化。

就此而言,当代青年对《后浪》的挪用和改写或许是一个症候性的案例。2020年五四青年节,在多家主流媒体的支持下,哔哩哔哩网站发布“献给新一代的演讲”的《后浪》宣传片。它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反响,正在于它以一种权威的姿态,抒情地、高调地承认了当代青年在历史新时势中的力量,特别是称赞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代青年参与抗疫的志愿行动和集体性力量,因此也含蓄地承认了作为“后浪”的当代“新青年”的政治主体性。然而,它又试图表达出对当代“新青年”的政治主体性及其力量的某种收编。于是,它既抒情地高喊“奔涌吧后浪”,却又明确地宣布,“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随即,同样是在哔哩哔哩网站上,出现了《后浪》的挪用和改写:《前浪》《非浪》等各种版本。《后浪》所展现的,是拼搏奋斗的都市青年形象,却也遮蔽了当代青年所处的实际的社会分工角色和生产-劳动位置的青年形



象,而在其中一个改写的版本中,画面一出场,就是一条红线决绝地划去“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在上方代之以“献给所有劳动青年”,从而清晰无比地将其被遮蔽的社会角色和位置凸显出来,实现了青年身份认同和政治主体性的再界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再界定是通过与《后浪》中的“我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而建立的。“我们”是“前浪”,是中年人,也是所有置身于历史新时势之中的人,但却并不必然是“新人”;当代“新青年”通过重新叙述明确地使自身从“我们”中分离,以自身明确的政治主体性反过来追问“我们”的普遍性,追问“我们”是否是历史新时势中的新的、更具普遍性的政治主体。“后浪”并不只是“前浪”的继承者,而更激活和再造着“前浪”。

当代“新青年”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新人”,他们重启了“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当代“新青年”的诞生是否预示着我们时代的“新人”正在被激活并普遍地生成?作为“新人”,当代“新青年”或许担当着这样的使命,他们正在进一步激活和再造“新人”的普遍性,使之成为现实的普遍性。当代“新青年”或许预示了属于我们时代的“新人”的模样——他们具有清醒的劳动者意识并致力于奉献给所有劳动者,同时具有深沉的国族情怀和文明担当。然而,中国道路的新时势不仅需要“新青年”,它更需要切身体验着这一历史新时势的普通大众为“新人”赋予更为具体的普遍性,需要这样的“新人”普遍地觉悟到自身的“新”,普遍地觉悟到自身所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就是创造一个所有劳动者更加幸福、中国的文明主体性更加高扬、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和平等的未来。

注释:

- ① 陈独秀:《通信》,《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 ②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53—90页。
- ③④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 ⑤ 汪晖:《世纪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08页。
- ⑥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5—566页。
- ⑦ 毛泽东:《永久奋斗》,《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 ⑧ 1958年以后,出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命名,并且在“文革”中大量使用,而“社会主义新人”的普遍使用并基本代替“共产主义新人”,则正式开始于1979年邓小平所作《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为论述方便,本文暂不区分“共产主义新人”与“社会主义新人”。
- ⑨ 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载《中国青年》编辑部

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潘晓”系取两个青年的名字合并而成。

⑩ 蒋子龙:《不惑文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65页。

⑪ 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

⑫ 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人民文学》1981年第4期。贺敬之在评选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作品时也说,“对于描写新人的、积极向上的作品,要提倡。为什么‘乔厂长’受欢迎,这和时代、和人民的愿望有联系。”见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小说家》1999年第1期。

⑬ 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东方学刊》2018年第1期。

⑭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体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

编辑 屠毅力 张蕾

Keywords: digital government;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society;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governance mechanism

Content, Path and Direction of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heng Lei

Abstract: Th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what th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what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how to transform, why to transform and for whom.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 and entity form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elements, covering economic industry, social life,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acilities is not the same as digit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promotion path of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eds not only the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elements, but also the revolutionary remodeling of process, rules, functions and ecolog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beneficiaries, objectives,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citizen centered, so that technology and cities can “turn for people”.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ing; co-governan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People's C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ycle of a Smart City: Implications,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Wu Jing

Abstract: Smart city is a new type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that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uses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ycle of a smart city, problems such as innovation stagnation, excessive innovation, and weakening of innovation legitimacy may occur.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unreasonable 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ycle, innovation purpose, and urban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smart c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novation cycle; innovation alienation; innovation approach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Youth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ity

Shi Anshu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new man” were the “new youth”, and the abstract universality of the “new man” was activated, recreated and actualized by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new youth”. As a result,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are formed, which is not only the dialectics of subjective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dialectics of creating new poli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era,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was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nguard and the main for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the typical image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have transformed into fashionable consumers and pure producers,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Chinese road, contemporary youth have re-displayed a clear subjectivity.

Keywords: new youth; new man; New Culture Movement; Chinese roa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and Youth Potential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New Waves” and “Youth”

Feng Qing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Chinese youth discourse, Li Dazhao's “Youth” has an explicit intention of “opportunism”, trying to respond to the political chaos in the certain period, with a political imagination about future evoked.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young generations' political “creation” is demonstrated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strategy is embodied in the organic inheritance and rhetorical re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classical idea of cosmos and the modern idea of civilizations. In contrast, the contemporary “New Waves”, which aims at “enjoying civilization”, presents a kind of blind optimism and does not arouse the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rational potential based on civilized order.

Keywords: “New Waves”; Li Daozhao; “Youth”;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youth culture